

仙桃春秋

仙桃文史资料
第 8 辑



90

仙桃市政协文史委 合编
仙桃市教育委员会

以史为鉴 百年树人

陈汉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经过十多年时间的努力，工农业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我们还要看到我们工作中有一些失误。四项基本原则早就提出来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不够，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泛起，去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便是例子。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历史告诉我们，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含糊。李先念同志强调：“用历史事实进行教育，让人民群众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真理，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有不少青少年对我国历史所知甚少，以致崇洋崇外，甚至连一点民族自尊心都没有了。这项工作，党的宣传部门要抓，政协文史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次市政协文史委与市教委联合编辑出版《仙桃春秋》，所载史料大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史料真实，事迹感人，可读性强。它把我市近百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有关人物有选择地编印出来，其目的就是让青少年及中青年干部、职工认识国情，了解乡情，懂得新中国创建不易，仙桃的解放来之不易，建设仙桃更是不易的道理；从而促使本书读者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做有觉

悟、守纪律的公民。

我认为，全社会都应该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对青少年给予正确的引导，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每个家长，每个公民都须深刻认识以史为鉴，百年树人的重要性，把思想工作抓紧，促进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这，也许就是编辑出版这本书的初衷罢。

目 录

以史为鉴、百年树人……………陈汉云

人 物

记解放初期的几位县委书记……………实 风 (1)

董老引我上征途……………杨显东 (6)

杨显东同志和我们一起吃萝卜饭……………王新年 (34)

忆舅父李寿山……………贾进英 (35)

进藏札记……………黄天佑 (39)

一个伟大的选择……………武身龙 (43)

第二故乡情……………杜俊民 (47)

黄春庭的一家……………张至贵 (51)

烈火炼真金……………尹长海 (55)

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等功臣谢炎炳……………升 隆 (56)

写在自首书上的壮歌……………傅献瑞 (58)

记一位抗日爱国志士……………王俊川 (61)

从中医到副县长……………李 悟 (63)

名老中医王佐才……………朱久之 戴同国 (65)

生命之树常绿……………涂阳斌 (68)

记一个普通基层干部……………肖 菁 (70)

花鼓名角陈尧山……………陈平生等 (73)

腾飞之歌

第三个里程碑……………涂洋冰 秦明星 (75)

记机耕船的诞生……………肖作玉 (83)

水利灌溉

夏甫庆与沔阳治水……………冯声启 (89)

附：前人筑泽口坝纪实……………姜 齐 (98)

水县长李文祥……………尹 三 (91)

忆杜家台……………陈 帆 (102)

范一侠当堤工局长……………刘庆英 (104)

名人轶事

张难先清廉轶事三则……………傅献瑞 (106)

附：六其居士杂布…………… (114)

怪人丁寿石……………彭树元 (116)

古代清官美号拾趣……………车驾明 (119)

社会拾零

沔城人物辑录……………姜 齐 (120)

闲伢子告状……………汪烈九 (122)

回忆保育院……………张 苏 (127)

沧桑篇

沔阳县迁治涉讼五春秋……………李耀五 (139)

记解放前沔一中学生参加“省运”前后
……………傅德章 (145)

记解放初期的几位县委书记

实 风

1950年5月我来到沔阳县(即仙桃市)委会工作。转眼40年过去了,然而解放初期那几位县委书记的言行至今记忆犹新。现仅述几点,以资留念。

一、他们外出的工具

沔阳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是谢健。那时县委机关只有一匹马,还配有一名饲养员。这马是专供县委领导同志下乡或赴外地开会骑用的。但谢健同志下乡从不骑马,把方便让给别的同志,自己步行。1949年10月谢健同志调地委时,县委机关派马送,他谢绝了。碰巧与地委书记杨殿奎同行,因谢较年长,殿奎同志让马给谢健同志,谢一再推让,两人都不肯骑。警卫员牵着马,两人从沔城步行到峰口,搭船到新堤。谢调地委后每次来沔阳都是搭船和步行。下乡到通海口左家桥、仙桃等地同样是步行。

二、他们撰写的秘书

在沔城的县委机关驻地——红花堤一户李姓大地主的院落里。每晚深夜,同志们都就寝了,院中的一间住房总是一缕煤油灯光从窗棂射出。县委书记赵抱一还在埋头办公。有时开扩干会赶写会议总结报告从深夜一直干到拂晓。当时

机关总务同志很体贴书记的辛劳，总是上街买点什么为抱一同志做“宵夜”。自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下达后，有关重要的报告，解放初期的几任县委书记大都是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我在地青委工作时听过谢健同志作的学习报告和在全地区青年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大家都觉得他理论水平高，概括能力强，抱一同志的报告是有份量的，中原大学、湖北人民革命大学、襄南公学分配来的学生干部听了深为佩服，后任的县委书记赵文华、李寿山、段景祥都是工农出身的，但在工作中却练就了一副本领。文华同志写的报告文理通顺，南下的老同志谈起来都说：“真象个知识分子写的。”1952年11月寿山同志就任书记时已是“知天命”之年了。他的老伴与我们同桌进餐时总是带着怜惜的口气说：“老李啊老李，开扩干会，深夜还在写报告，磨脑筋！”。段景祥同志继任书记后仍是自己写。他没进过学堂，参加革命后学了点文化，但政治和政策水平是高的，写出的报告有条有理。有时忙不过来，也要坚持写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解放初期的县委办公室很少为县委书记草拟报告，这似乎是人所共知的。

三、他们身边的干部

毛主席说过，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正确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解放初期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有华北南下的，有五师突围的或就地隐蔽归队的，有革命学校短期培训的青年学生，有本地出生的工农分子，还有极少数留用人员。解放初期的县委书记十分注意团结干部，无论是哪个方面来的，一

律按德才标准选拔重用。当时南下干部和五师突围的干部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党性强，多担任区以上的领导职务；学生干部有文化，接受新事物快，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不少人被任命为工作组长。赵文华同志从省委组织部下派沔阳任县委书记期间，大胆提拔了5名县级干部（其中农民干部1名，学生干部4名）。荆州地委组织部非常重视，要县委组织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上报。1951年6月，洪湖、沔阳分治后，沔阳县工委副书记周崇川调洪湖，沔阳缺副书记，我们建议调仙桃镇工委书记马杰任此职，因工作需要马杰不可能来。文华同志对我说：“你们青年团的干部都比较强，马杰同志不来了，就由你们几个人搞吧！”那时我还是候补党员，也就勉为其难地挑起了担子。对中原突围掉队的干部，只要弄清隐蔽期间无叛变行为，就大胆予以启用。原天潜沔坚持革命斗争委员会的万洪纶同志，原荆当远县的区长傅正时同志，他们的问题都是谢健同志帮助查清的，并批示组织部门恢复其党籍并妥善安排。洪纶同志调洪湖县任司法科长，正时同志调汉川县任区长。对被错处受冤屈的同志认真执行党的平反政策，原第二区工作组长刘仁良因被诬告为土改中错杀老革命监禁了4年，平反回沔阳要求分配工作，组织部拟令其回家。文华同志知道后，热情地接见刘并予以安慰，立即通知组织部改变原决定，安排到第一区担任文教助理员。文华同志坚持原则宽厚待人的事还可以说许多。回顾起来，由于解放初期干部政策执行得好，那几年沔阳的工作就较为出色。

四、他们自己的家属

1949年我到沔阳中学建团时暂居仙桃镇政府。不多久才知

道镇政府秘书崔新维同志就是当时县委书记赵抱一的妻子。老崔带着一个小儿子和抱一同志的老母亲住一间极为简陋的瓦房。那时实行供给制，全家生活拮据。抱一同志在沔城不时从自己有限的津贴中分出几元钱送来贴补家用，自己剩下的钱就不多了。当时县委书记与一般干部一样，除吃饭穿衣由国家供给外，每月津贴费2元，根据职务和工龄每月还有点保健费。抱一同志有吸烟的嗜好，为了节省烟钱，我经常看见他一支卷烟分几次吸（吸一截捏熄后放着，缓一会又点燃再吸）。为什么要两地分居，住在一块不行吗？后来才知道，中央有规定，直系亲属不得在同一单位工作。抱一同志也是有意识地锻炼一下子小儿子，不让他从小养成特殊化。

李寿山同志处理家庭问题的克己奉公精神是少有的。他老家在河北保定农村，老伴当时任村妇联主任。寿山同志南下后夫妻分居数年，直到1952年冬他任县委书记时老伴才带了小女儿前来探亲。当时，县委书记吃“中灶”，老伴和我们一块吃“大灶”（注：当时的干部伙食标准分小灶、中灶、大灶三个等级），并没有什么特殊照顾，不到一个月，他主动提出让老伴回河北。这时，正在沔阳检查工作的地委组织部部长赵文华不同意，说寿山同志年岁大了，应留老伴在身边照顾生活。寿山同志斩钉截铁地说：“她有她的工作，应该回去！”。老伴和小女儿哭哭啼啼地离开了仙桃。当时我思想上引起了极大震动，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然而他对一般同志的家属来探亲，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要总务处安排住房，吃客餐招待饭，还主动解决了不少同志两地分居问题。寿山同志1953年7月调荆州任总工会主席，后升任副专员，听说离休后把积蓄的钱都献给生产队种

果树发展生产，文革中在家乡去世。儿女都在家务农，并未因寿山同志的高干地位而安排什么工作。

五、他们出差的消耗

这是发生在1951年冬去荆州开会途经汉口的一件小事。为了总结第一批土改工作、部署第二批土改，荆州地委召开有各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公安局长、妇委书记、团委书记参加的地委扩大会。我记得沔阳去开会的有赵文华（县委书记）、段景祥（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月芳（妇委书记）、赵保（三区区委书记）、曹学诗（八区区委书记）、景生（团县工委组织部副部长）6人。那时去荆州陆路交通不方便，唯有走水路。我们先到新堤与洪湖县委去开会的同志会合后，搭小火轮下汉口再改乘大轮到沙市转荆州。途中为等大轮在汉口停留了三天，住在汉正街供宿不供食的小旅社里，上街吃饭。那时出差补助还没有成文的规定，用多用少都可以报销。我们到汉口的第一晚餐是进的餐馆，十多人搞了两桌比较丰盛的筵席，很用了点钱。县委书记们商量，这都是吃的老百姓的，钱用多了不好，要改变一下。从第二天起就化整为零，三三两两结伴到江边小饮食摊进餐。记得我和段景祥同志、段的警卫员三人一餐只吃了几角钱。1952年7月“三反”时，赵文华同志在代表县委所作的检查报告中，还提到汉口餐馆吃饭这件事。时过39年的今天，回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董老引我上征途

杨显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紧接着芦沟桥事变的爆发，上海、太原相继失守，南京紧急疏散，武汉也岌岌可危了。一天，我和孙耀华，激动地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求见董必武同志。

门卫接过我的名片一看：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专员，杨某某。他一声不吭地上楼去了。随即下来一位中年同志，说：“正忙着，没时间。可以和我谈谈吗？”我说：“有重要事情，要当面和董先生谈。”这样，董老才亲自下楼接见我们。一见面，孙耀华就连忙替我介绍：“他是农业专家，美国博士，刚从苏联考查回来。”

我是湖北人，从小就听过一些有关董老的传说，总以为他是个威风凛凛，文武双全的人物。不料相见之下，竟是那么文质彬彬，和蔼可亲。

开始，董老很少言语，只是含笑地听我们说明来意。接着就询问我的情况，问得相当具体，最后才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表示赞赏和同意。

我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出身在沔阳一户贫寒的农家，“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父母几代都逃过荒，要过饭，受尽地主恶霸的欺凌。我六岁丧父，很小就放牛，下

田干农活。以后农闲在私塾念书，直到十三岁才勉强上小学。后来，上了大学，学农科。毕业后，在冯玉祥将军的部队里，当过农业教官，接着回湖北，在湖北棉业试验场工作。其间，即一九三一年，曾陪同国际联盟代表团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去，也就是我的老家，去做过调查，使我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开始有了感性认识。一九三四年，在社会贤达石瑛、李范一的支持下，公费留学美国，专攻棉业。当时，在美共同学的帮助下，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九三七年毕业回国时，由美共介绍到苏联去访问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那时正是斯达哈诺夫运动的高潮期间，使我再一次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育。

当我抱着农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越过关东军控制下的“满洲国”，好不容易抵达北平时，恰逢“七七”事变，眼看灾难深重的祖国，炮火连天，民不聊生，拥兵百万的国民党，贪污腐败，节节败退。内心愤慨，无可言状。虽经师友介绍了上述名片的那个职务，但是刚在南京报到，就随机关撤退到了汉口。

当时的武汉，已成为后方的政治中心。平、津、京、沪各地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这里。国民党却不闻不问。群情激昂，报国无门。面对现实，我既痛心，又焦虑。好些朋友如李公朴、赵师梅、孙耀华等，都同我议论着如何准备打游击。可又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一个偶然机会，中国银行管理处的农贷稽核张心一和我们谈起，怎样能在湖北招训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以便往后借发放农贷，发动农民群众打游击。我还听说，苏北、皖北的进步青年，有的已利用这种在农村放款的机会，组织农民，训练农民，成为抗日的游击力

量。这使我联想起是否我们也可以在湖北招收流亡学生，进行游击训练呢？于是，我先去会见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瑛，那时他正要找我担任湖北省棉业改良场场长。他完全支持我的设想，同意用湖北省建设厅的合法名义，出来筹办。我还提出要用棉业改良场的部分经费，进行活动。然后我同孙耀华去汤池找李范一，因为他在应城的汤池办了个农村实验区，有现成的房屋设备，可以用来办训练班。我们找到他，他表示赞成，并自告奋勇，愿意参加。接着我又去找民族资本家周苍柏，因为他的政治倾向比较进步。果然他慷慨解囊答应在训练费用上，大力支持。这样，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

我有个本家妹妹叫杨刚，是地下党员，后来任过周总理秘书。我从一九二八年以来就同她有来往，在政治上受她的影响很大。但那时我只知道她思想很进步，有独到的见解，令人信服。她曾多次和我谈到，抗日救国，唯有依靠共产党；国民党口是心非，不可指望。她不但给我讲过共产党“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就发出号召全面抗战的通电，还给我介绍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风”，非八路军莫属。我又去征求大家的意见，他们一致赞同，这才鼓起勇气，直接求见董老。

本来，石瑛、李范一是董老青年时代的朋友。所以，随即由石瑛出面，在他家里请客。席间，董老听了我们对时局的一些看法之后，剀切地表示：日本貌似强大，但底子很薄，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抗战终将获胜。而要赢得胜利，不能单靠军队，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全民抗战。战争越持久，人民的威力越将显示出来。因此，举办训练班，

培养有觉悟、有才干的青年，并通过他们，宣传组织群众，是关系抗战胜负的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二

那次聚会后的一个下午，董老突然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汉口江汉路原上海银行楼上）。随同前来的还有一位英俊而又消瘦的青年。董老郑重地向我介绍：“我们决定派陶铸先生到汤池训练班来负责。”事后知道，陶铸同志被国民党囚禁了十年，不久前才出狱。

当天，我就陪陶铸同志会晤了石瑛和周苍柏。次日，又一同坐船到汤池见了李范一。就在李范一的家里，商定了训练班的名称、组织、经费以及招生对象、生活安排等问题，并正式成立了训练委员会。主要成员为：主任李范一，教务主任陶铸，总务主任许子威，我负责筹集经费，并和孙耀华一同在武汉主办招生工作。

那时间，我的社会职业是湖北省棉业改良场场长，场址远在随县，我只能偶尔去照看一下，几乎全部时间都放在汤池训练班，我不断地往返于武汉和应城之间，处理一切对外事务，因而经常要向董老请示汇报，也就有机会和他谈时局、谈政治，并反映自己的思想认识。我那时的想法，主要是觉得自己是搞科学的，改良农业，造福农民，才是本分。至于革命的事，应该让政治家或懂军事的人去做；就我来说，那不过是一种副业，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同时，上海、南京的很快沦陷，国民党的昏庸无能，不能不令人悲观失望；共产党虽然大义凛然，毕竟力量过于单薄，又不免使人忧心忡忡。

这些思想问题，我都断断续续地向董老暴露了。有一天，

他老人家严肃而又恳切地和我作了一次长谈，至今记忆犹新。主要是说：“你的父母祖辈，都是历尽千辛万苦的贫苦农民，现在的农民也还象他们一样在受苦受难，以你的家庭出身，能够成为一个‘士大夫’真不容易，不过更不容易的是，以你今天的条件，还没有忘记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农民大众。你不但没有养尊处优，而且还愿意下乡，未失农家子弟的本色。”讲到这里，停了一停，看了我一眼，又接着含笑地说下去：“不过，你那种农业救国的观点，或者说，要从改进农业技术上去改善农民生活的想法，却是书生之见。因为单凭科学技术，是不可能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的。国民党的那些官僚买办，怎么会让你放手去干呢？就算你能够育出些棉花良种，改进一些栽培方法，使棉花产量有所增加，棉花品质有所提高，结果，真正能得到好处的，也还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地主、资本家，农民是沾不到什么光的。这些实际问题，你都想过么？”

在反动统治下从事农业工作的重重困难，特别是棉农所受的压级压价，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我不但曾经亲历其境，甚至还直接受过许多打击。过去我总是想不通，或者知难而退，不敢追究。如今经过董老这么一指点，才开始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董老看我听得很认真，又继续往下讲：“我知道你上过教会学校，信过基督教，曾经以为宗教可以救国，后来你觉悟了。但是，对于今天的形势，你还没有认识清楚。现在的农村，国民党到处抓壮丁，弄得鸡犬不宁，连田地也没人敢种了，难道还能够实现你那农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吗？凡事必须从实际出发，按我国的实际来看，首先要打倒土豪

劣绅、买办军阀，彻底铲除剥削制度，解放农民。农民获得了解放，才会去学文化、学科学，也才能把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得到改善。”我一边听，一边点头称是。

这时，董老站起来，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目前国难当头，抗战第一，要全民总动员，把敌人赶出去。所以办好汤池训练班，非常重要。你有学识、有抱负，决不愿和国民党同流合污。我们欢迎你这样的朋友。”

这次谈话不久，也就是一九三八年元月的一天，我和陶铸同志从汤池去汉口。起初，他说董老要介绍一位领导人和我见面；到了汉口，他就带我上旧日租界大石洋行——中共中央长江局，这才告诉我那位领导人就是周恩来副主席。

周副主席完全是政治家的风度，一见如故。他首先问我个人的情况，接着要我谈谈美共和苏联农业的情况，当他听我说到美共的同志曾帮助我学习《资本论》时，惊讶地笑了。后来他要我谈谈我个人对时局的看法，一直谈到夜深十二点，我才告辞。他约我明天再谈。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就去了。这次主要是周副主席讲话，话题是敌我双方的战局，他从中日两国的历史，引申到当时的形势，重点是论述关于抗战的持久性。他说得那么深刻而又生动。大意是日本帝国主义既不能一下子把我们逼上昆仑山，我们也不可能很快就把他们赶下太平洋，一时一地的得失，乃兵家之常事，最后的胜利，取决于以我地大人众之优势，压倒对方妄图速胜的弱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因此必须团结一切爱国的仁人志士，包括科学家、民族资本家和各方面的开明人士，共同奋斗。他鼓励我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谈话一直持续到十点多钟，我感到耽误他的时间太多，便坚决要走。临

别，他说汤池训练班的工作很重要，很有意义，要把它办好。不过这是归董先生主管的，也就不便提什么意见。

董老和周副主席的教导，言近旨远，语重心长，尤其是那种同志般的态度，殷切的期望，使我深受感动。至于他们的渊博的学识，深远的意境，更加令人心折。当时我和陶铸同志共事，起初我只知道他是黄埔军校学生、军事家，不料，他的组织才能、知识经验，乃至写文章、作演说，无不出人头地。过去，我也曾与国民党的中层人士有所接触，相比之下，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确有非凡的人才。而远非国民党所能及。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必能振兴。

三

汤池在湖北应城县，本是偏僻荒村。三十年代，有些知名人士，先后在全国各地选择据点，创建实验区，希望从改变落后的农村面貌入手，进而挽救中国于危亡。如陶行知在南京晓庄，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高践四在无锡社桥等等，应城的汤池原也属于这一类实验区，由李范一先生主办，但是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抗战便爆发了。所以他很乐意让出来建立汤池训练班。

汤池训练班是个很独特的组织。一方面它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建校方针、教学内容、骨干配备，全归董老和陶铸同志亲自筹划掌握。训练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平津沪汉各地大专和中学的进步青年与共产党员。训练的目的就是培养干部，在敌后动员群众，打游击，抗日寇，可是另一方面，它又是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主办的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学员结业之后，由国民党湖北省合作委员会分配到各县去发放农业贷款，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个训练班的经费，包括